

# 信息的需求与反需求: 农民信息诉求行为研究

——基于北京市郊区农民观念提升工程的观察与思考

■ 李红艳

**【内容摘要】** 农民观念的提升是一个农民主动参与和“反被动参与”的过程,他们以行为“对抗”社会组织和媒介对他们的想象,同时又依靠他们作为传统价值观念携带者的“优势”,对政府、培训者、基层管理者进行“反想象”,这种“反想象”带有一种失去土地之后的灵魂漂移的意识,也带有一种“被动个体化”之后的无奈心理。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在地方知识、地方时间和地方空间中,如何在农民的媒介消费与生存伦理中找到结合点,以及如何在外来者的信息提供和农民的信息反需求之间更新培训知识体系,是认知中国农民现代化转型的一种重要途径。

**【关键词】** 农民观念; 信息需求; 现代化; 个体化

## 一、研究背景

吴先生 2017 年 48 岁,是北京市郊区的一位农民,他居住的村落面临拆迁,签订了拆迁合同之后,所选择的回迁房要在三年后才能居住,于是他带着全家居住在距离原来村落所在地 15 公里左右的北京与河北交界之处,这样租金可以便宜一些。他们家的生计来源主要依靠农业之外的收入,但是拆迁之后他还可以继续耕种土地三年,三年之后土地将会被国家承包,他们家可以每个月拿到一定的分红。他有一个儿子,2017 年 29 岁。原来在村里的街上有一个小家电零售店,拆迁之后,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我没有干过农活,以前外出打工,后来自己开店,现在拆迁了,店也不能开了。”吴先生的太太也是传统农民,一直在家里干农活,没有外出打工的经验,吴先生年轻的时候出外打工 8 年,曾经做过工厂工人、干过销售,还做过主管,按照他的话说“在村里是有点威信的人。”拆迁之后他们家预计可以拿到三套房子,他们打算一套给儿子结婚用,一套自己居住,另外一套出租,还得到了一部分的拆迁款。生活似乎是按照他们的设计在完美无缺地进行着,但他们神情焦虑,充满了不安全感,“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吴先生这样的家庭在一些城市化的乡村,或者是城市郊区普遍存在,这些家庭可以说伴随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而逐渐进入了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拆迁意味着将传统农民身份以土地“割让”的方式,让他们体验到“一夜富裕”或者“一夜身份转变”的境遇,将他们从传统的农民身份中“剥离”出来,赋予他们一种“新”的社会身份。这种“新”的社会身份的属性及特征则是需

要另外探讨的一个命题了。

简单来说,城市化给中国农村所带来的变化,并非仅仅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等因素可以涵盖的,人的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中介。笔者认为,本文所提到的吴先生一家人的境遇,以及这种境遇所导致的身份转变,一定意义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民身份。由于村落的多样化、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和地理空间布局的设定,确实将传统的农民分割为多样化的农民群体。但拆迁农民,由于其原有土地所有方式和居住空间的特点,却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未来将是决定中国乡村城市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这些特征的研究,也意味着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另一种关注。这种关注的视角便是农民群体本身的现代化问题。

现代化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各种媒介信息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勒纳(Daniel Lerner)将现代化的过程与媒介的使用状况相关联,将社会分为三种类型:现代型、过渡型和传统型。其中,与这三种类型相关联的指标是读写能力、城市化程度和传播系统。因此他认为,城市化是现代社会的第一个发展趋势,而与此相关的则是人本身的读写能力和对传媒的使用和消费能力<sup>①</sup>。汤普森(Thompson)更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即经济权力(资本主义)、政治权力(民族国家)、强制权力(军事力量)和符号权力(媒介传播)中,媒介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构成体系,媒介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关系<sup>②</sup>。作为信息传播核心的媒介系统,因此成为农民群体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子。

中国学者对受众的调查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继而零星散布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研究视角开始将目光集中在农村、农民身上,也关注农民工及其留守群体的媒介使用和消费状况、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媒介使用状况。<sup>③</sup>也有学者关注作为信息弱势群体的农民、农民工手机使用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sup>④</sup>

除此之外,政府机构、公益性组织和商业机构也以各种形式进入农村信息传播市场,电影下乡、家电下乡、文化下乡以及技术下乡等传播形式,成为对乡村社会进行信息传播的主导趋势。对于涉农媒体而言,在农民群体分化、农村社会信息传播场域转换及资本市场对农村市场的冲击之下,如何重新定位、将信息嵌入到农民群体中,并与他们在城市化中的需求、个体现代化的过程和对媒介的信息的认知系统结合起来,便是一个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了。

媒介技术的扩散不仅改变了人际关系的交往模式<sup>⑤</sup>,也为农民的观念转变提供了一扇窗户。拆迁这一城市化过程中的行为,进入 21 世纪之后其信息传播模式也发生了转变。集中在拆迁这一领域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拆迁政策、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农民的权利维护、农民的职业诉求、拆迁满意度等方面。<sup>⑥</sup>国外研究则集中在跨国之间的移民适应研究、移民政策研究、移民流动的特点、移民媒介文化特点、新媒体形式对移民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研究上<sup>⑦</sup>。这些研究对于拆迁农民观念改变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而拆迁农民的信息需求和身份转变之后所遇到的多元化层面的问题也甚少研究。

在另一方面,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问题,当下学者对现代性的认知主要基于对欧洲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将现代性被分为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吉登斯认为,第一现代性的三大主要动力是反思性(reflexivity)、时空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和抽离(dis-embedding),在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的过渡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在时间和空间概念成为流动状态的同时,也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特征体现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资本在技术所带来的瞬时性(instantaneity)特征中,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改变为液态(liquid),信息取代物质产品、消费者取代劳动者(生产者)成为资本市场的动力<sup>⑧</sup>。也恰恰是在这个点上,媒介的现代性与消费者在媒介组织信息传播的链条上被深深地镶嵌在一起。换言之,农民的现代性与他们对媒介信息的传播能力、消费能力和媒介的使用能力结合起来了。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并不会如上述学者所

述,完整地呈现出这些特征来。鉴于政治文化和媒介体制、大众社会心理和价值观上的差异,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更为复杂一些。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的断裂与转型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有其独特性,体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sup>⑨</sup>1949 年之后中国新闻发展的实践也部分体现在这种独特性之中,媒介体制的行政化格局以及这种行政化格局所带来对行政资源的垄断,以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1 世纪初期加入 WTO 之后的媒介产业化过程,不仅改变了媒介信息传播系统,也构建了媒介与大众之间的新型关系。随着媒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普及,现代媒介系统以不均衡的方式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扩散。其中还夹杂了新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媒介形式,如手机、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等。因此,媒介的现代性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乡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过程和特点。

由此,本文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生产者为导向的媒介信息传播系统转向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媒介信息传播转向的过程,分化之后的农民群体经历了多种形式的由政府、社会组织 and 商业企业进行的培训,在这些培训中他们是如何“发现自身的”、自我成长?本文试图从行动者和参与者共同构建农民观念提升这一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寻找到构建参与者想象共同体的可能性,解读当代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诸种特征。

本文主要以北京郊区<sup>⑩</sup>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实施的农民观念提升工程为例进行分析。首先介绍农民观念提升实施的背景和基本概况,继而分析在培训中呈现出来的农民的信息诉求、他们对共同体的想象和观念的逐渐提升过程以及媒介在其中的中介性作用。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地方、空间与时间——想象的共同体;第二:信息与监控;第三:媒介消费与生存伦理;第四:信息需求与反需求;最后是结论与思考。

农民观念提升工程是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市大兴区农委联合举办的培训工程。从 2011 年开始,第一期为期五年。2011 年培训内容主要分为生活方式的培训、理财行为的培训和就业观念的提升三个方面的内容,2012 年增加了北京精神和阳光心态方面的内容。2013 年增加了中国梦的部分,2014 年增加了美丽大

兴、幸福生活部分,并将培训修订为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此后基本延续了这些内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2016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教材方面增加了农村法律法规和电商等方面的知识。该工程的背景是城市化过程中,北京郊区农民的土地正在加速以各种形式被资本化,农民群体积累了几千年的“祖屋”在这种资本化过程中,被分割为城市象征的楼房和土地征用的补偿金。那么这些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地”的农民一夕之间失去了“土地”之后,如何适应新的“社会身份”带来的冲击?一些拆迁户在拿到拆迁款之后,出现了赌博、过渡消费等现象,这些行为直接导致了当地政府对社会结构的一种担忧,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农民群体的观念转变,并将其更好地纳入城市社会管理系统中,便成为进行农民观念提升工程的最初动机,培训对象初步定为40~50年龄段的拆迁农民。

培训的过程分为前期调研、编写教材、师资班培训、重点班培训和普通班培训以及后续的效果调研总结。前期调研集中在2011年5月22日至24日期间进行,课题组分为4个小组,分别对A区的5个镇的10个村庄进行了调研<sup>①</sup>。本次调研所采取的调查方法包括:焦点小组访谈法、问卷法和个人深度访谈。其中,焦点小组访谈主要对村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每日活动图和季节历等工具来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情况,同时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深入讨论形成村民对培训需求的一致看法。问卷法主要是从统计角度对村民的基本情况、观念意识和培训需求进行了解,分析村民对就业观念、消费理财、生活方式、培训需求等内容的统计性选择结果。个案访谈主要是针对某些有特殊背景和特殊故事的人进行深度访谈,期望了解其对村民培训需求的深入意见及其选择背后的原因。这三种方法相结合,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种不同角度对A区村民培训需求进行全面了解,为培训教材的编纂和培训课程开发打下基础。

调查显示,村民对法律法规、营养与保健、致富与创业、投资理财这四项的培训需求较高,其需求比例分别达到了50%、46%、35%和34%。另外,家庭财务管理和家庭教育也是村民培训较为关注的方向,这两项所占比例也均超过了20%。此外,旅游知识、娱乐与休闲、艺术、其他类所占的比例也达到了10%~15%之间。需求最小的是家庭理性消费和家庭人际关系,所占比例均低于10%。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依照的还是调研前设定的三个板块进行撰写,由于在培训教材的形式选择方面,约47%的受访者选择了图文并茂的书籍<sup>②</sup>,因此,教材专门增加了很多图片,编写教材

的过程中,培训者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

政府人员:给农民的教材应该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因为农民的文化水平集中在小学初中,高中较少,他们并不喜欢看书。

培训者:仅仅依靠图片的话,很多问题说不明白,农民怎么能看懂呢?

政府人员:是不是可以编写不同层次的教材,如师资班、重点班和普通班?或者教师用书和学生用书?

培训者:不太现实,讲课可以根据对象调整,教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编好(2011年6月份编好教材8月份要正式投入使用)。

双方研讨之后,妥协的结果是增加了很多案例,图片只是象征性地增加了一些原创性的图片(其他图片考虑到版权问题,没有采用)。

师资班培训在2011年的暑假期间进行(2011年7月25日到8月1日)。参加人员为每个镇3个人左右(14个镇)和一些事业单位的辅助人员,大约40人。培训目的是:(1)掌握A区整个培训项目的目的要求;(2)了解当前农民意识的主要问题、培训需求、意识更新的主要内容;(3)掌握针对农民培训的基本方法。换言之,就是要求培训者(即课题组的老师)在五天内要将培育出能够针对农民讲课的师资来(包括两天授课,两天讨论,一天练习)。

第二个阶段是示范班培训,即各镇组织各个村里的干部集中培训,原计划这一层次的培训由师资班的成员授课,但最终还是由课题组的老师进行培训。

第三个阶段是普通班培训,即各镇按照五年培训的计划,每个镇每年培训2000人左右(人数根据各镇的总人口进行核算)。

2011年的培训计划由于时间关系在11月底完成,组织了来自各镇的师资力量进行座谈,并提供他们的授课资料,补充整理之后对2012年的培训教材进行修订和补充。2012年培训之前,政府部门和课题组一起进行了区政府、镇政府和村干部组成的座谈会,以便了解第一年培训之后的总体概况。培训结束之后,则由政府组织培训总结会和由教师实施的培训后总结会。2012年的培训依照2011年的培训层次顺序进行<sup>③</sup>,时间安排上比较从容,2012年11月29~30日进行了年度项目总结会,2013年1月则开始对新一年的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背景和农民的综合状况<sup>④</sup>。2014年、2015年延续了上述的方式,根据座谈会的反馈,增加了农民观念提升后的一些经典案例,这些案例汇总后放在教材后面。同时,为了对工程进行更深入的总结,在2014年8月到9月之间在A区

六个镇的几个村落进行村干部访谈,试图获得变迁中农民群体更多的相关资料,个案访谈大约50例。2015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2016年开始的时候,项目的名称改成农民素质提升工程。

连续七年的培训过程笔者全程参加,前期调研、教材编写和修订、三个层次的培训<sup>⑤</sup>。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A区的经济开发区单独组织了培训,除了参加师资班培训之外,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培训是由镇里自行组织的<sup>⑥</sup>。此后的培训中,有个别镇独立组织示范班,参加示范班培训的镇保持在11~13个之间。2011~2015年共计培训10万余人次。2016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培训2万人次。2017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目前项目仍在实施中。

## 二、地方、空间与时间(place space and time)

地方含义的改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维度之一,传统社会中的地方意在强调某个社会行为的发生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强调参与者的“同时在场感”。正由于这种“同时在场”限定了地方的边界,现场感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一种感知。这种感知现场的实践能力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开始与“不在场感”混杂在一起,构成传统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

师资班(30~40人左右)、重点班(30~60人左右)和普通班(200~500人左右)尽管在培训对象的数量有差异,但在地方的选择上,采用了一个传统社会的“地方”概念,讲授空间的布置也参照了学校上课的模式,会议室被“转换”为教室,授课的讲坛设置沿用的是主席台的模式,培训者和授课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大概在十米左右,还有“上下”之分,讲授者常常觉得有“力不从心”之感,可以使用扩音器,但是声音好像穿透的并不是“在场者”而往往是“不在场者”。在这个空间中,手机的铃声不时响起,听课者交谈的声音间断持续着,维持秩序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大声训斥声在空间回荡着。窗外可以看到的是不远处茂盛的农作物和在四季中闲置的土地。时间在这一刻是凝固的,声音,无论是讲授的、听课的还是管理者的,更像是从另一个地方传出来,令人有一种尽管身在此中却又置身事外的感觉,时间与声音之间的关系在地方的背景中被凝固了。

在这个空间中,传统的印记很显著,地理形态上的人们被限定在一个“同时存在”的地方中,他们带着各种“任务导向性”的动机:听课者每次上课需要签到,每次上课可以获得50元补贴。普通班中这种人员的混杂为这种地方的限定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人

员“边界”的划定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授课现场政府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核对人数,村干部将各村的名单报上来,村干部按照身份证号和人名对应,完整的签到才可以保证在这个“地方”获得50元的酬劳。

报酬、交换、信息、控制、互惠等因素在这个被固化的“地方”构成了一个祥和而封闭的想象,空间暂时被搁置了,但是手机铃声的不时响起,又打破了现场与非现场之间的空间阻隔,“不在场者”嵌入到“此地”,将时间和空间延伸,地方变成了“此地”和“此时”,“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关系被消解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培训更像是一个流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既有不在场的人和物,如电话联系的人、房子外边的自然景观和农作物以及象征着城市标志的水泥小楼和小卖部,也有在场的授课者和听课者以及维持秩序的政府工作人员,在这个社会活动中,进入现场和不在场的人,在触摸信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sup>⑦</sup>。

一位60岁的农民说,“我是替我儿子来的,我闲着有时间,他没有时间,讲课内容挺有用的,我回去告诉他。”

一位敞着上衣、穿着布鞋的农民说,“没想到老师口才这么好,比我们镇里的好些干部强多了,起码没语病,比如那些啊、嗯之类的。”

一位28岁的青年农民说,“坐在这里有点时间长,没想到讲课内容这么有用,早知道的话,我前几期就来了。”

这些在授课结束的时候特意告诉授课者感受的农民,他们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反馈,更是一种心理的莫名期许与潜在的言说欲望,也显示了他们对信息的一种独立判断和成长能力。

“我从小学毕业后就没有上过课了,没机会,也没时间。”

“像我这种年纪的人(笔者注:46岁),在家帮着带孙子,想出去工作,也不可能。听课还是头一次呢!上一次还是上小学时候,以后就再没上过课了!”

笔者发现,第一年(2011年)参加培训的农民年龄集中在40~59岁之间的最多,占89%<sup>⑧</sup>。他们在听课的时候,获取的并不是某一类的特定信息,而是一种享受政府赋予他们“特权”的一种机会,在获取这种机会的过程中,他们发展了自己对于过去时空的想象,回想起自己的教育背景,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形成了授课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之间的协商空间,在这种协商中,信息成为背景,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框架恰好形成了从传统到现代之间的混杂特征。“时间”被延长到了听课

者的上学时代,空间被分割为记忆中的教室与现在的培训现场,政府作为一个符号被绵延到教育系统中,农民身份作为一个凸显的信息,成为这种框架中最有力的一种工具。

第二年(2012年)参加培训的农民40~50岁占68%,39岁以下的年轻人占24%,60岁以上的农民占8%。在听课的时候,他们想象到的不再仅仅是原来的教育背景,而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些诉求。

第三年(2013年)参加培训的农民40~50岁占61%,60岁以上的农民占21%,39岁以下的年轻人占18%。2016年参加培训的农民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40~59岁组,占64%,其次是20~39岁组,占25.5%<sup>①</sup>。可以大致看出,参加培训的农民集中在40~50之间,与项目设计的目标人群大致一致。培训中,农民不停发表自己的感想:

“这里讲的很多信息,我都知道,就是不太系统。”

“就业的信息很好,对我找工作有用。”

“理财不容易,来村里讲课的人不少,好多不太明白,就怕上当受骗。”

显然,农民在对他们眼中政府符号的认知中,将历史感与现实感、传统农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差异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想象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新的时间意识和旧的时间意识重叠,并沿着交叉的记忆轨迹,将现在的空间与旧有的空间融合,这样,地方、时间和空间对共同体的想象中获得了同一性,固态的时间和空间被延展到信息的视域之外。

### 三、信息与监控 (information and multi-surveillance)

授课者(培训者)既是这个封闭空间和凝固时间中的信息掌控者,也是信息的监视者。表达的话语符号在政府话语体系的边界上盘旋,政府工作人员也是信息监控者,监控的不仅是听课者(受训者)也是授课者(培训者)。三者之间的信息关系被分割为不同的场域。

对于授课者而言,面临的是一个博弈的场所(game place)。在这个博弈的场所中,授课者面临几重博弈场景:第一重是知识分子身份与培训者身份之间的博弈。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知识传授者、生产者,同时也是知识消费者,在农民培训中,既要审视自身知识系统与底层诉求之间的关系,又要保持知识阶层的一种精英意识,授课的对象被在这种抽象想象的博弈中被分割了,阶层身份、阶层话语与底层关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一层信息的自我监控形式,这种自我监控由于是出自授课者内心的自觉意识,在授课中往往会出

现“溢出”边界的状况,因此授课者会说“我是替政府授课的,你们也是为了政府听课的,所以呢,我本人的意思是……但是不适合在这里讲述。”这种“溢出”边界便是信息的公共性与私有性在自我监控中的一种方式,也是自我博弈的一种结果。

第二重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作为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在教育体系中,既承担着知识传授(教学任务)的任务,也承担着科研工作(生产知识的任务),教育体系的需求和自我意识对于话语体系的诉求之间往往会出现冲突的状况,这种冲突容易造成知识分子在学院思维中的一种焦灼感,这种焦灼感伴随着他们作为知识消费者的身份而不断增加,也伴随着他们对受众的“挑战”而呈现出内在的冲突状况。例如有一位教师,培训之前觉得和农民讲课“心里没底”,特地去参加了几个相关的培训班,感觉这样才能找到学院的知识生产和乡村社会的知识消费之间的连接点。但是在讲课的时候,却明显感觉到与农民的信息消费需求之间出现了断裂状态,这种断裂状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错位的冲突,授课者与听课者都在释放着自身信息诉求的动机与目标,但双方的交汇点出现了位移。

第三重是学院派话语体系和非学院派话语体系(本文是指作为培训者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博弈。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中,斯图亚特·密尔(Stuart Mill 1859)<sup>②</sup>所描述的多元化的观点呈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自由下理想的乌托邦,但却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在这种市场中却逐渐沉淀下来,这种沉淀往往是无意识的。商业化的观点诉求、日常化的观点陈述,呈现在这种沉淀的话语背景中,与学院派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便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知识话语的选择在这里演变为不仅是生产和消费的问题,而成为了二次消费和二次生产的问题,从生产话语向消费话语的过渡无疑成为商业化和日常化的一个趋势,现代性的含义在这里转化为符号经济,生产的意义开始缺失,而消费的时尚开始兴起,在这种消费时尚中,美学话语开始取代认知话语成为一种趋势,商业和大众需要的不再是生产性的学院派的认知话语,而是带着符号化的美学话语。这一点,Scott Lash和John Urry在《符号和空间经济》(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1994)<sup>③</sup>是作为美学反思和认知反思来进行区分的。大众对于偶像的诉求也从生产性的转化为消费性的,即消费偶像取代了生产偶像<sup>④</sup>对于当代中国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而言,面对正在改变的大众话语导向,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认知话语体系,开始用一些消费性的话语、时尚的话语来“迎合”大众的诉求,从而建构一

种新型的大众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便是学院话语体系和农民话语体系之间的博弈。学院话语体系重在逻辑性和专业性,农民话语体系则更重在日常性和工具性,二者之间“严丝合缝”的对接,不仅仅是话语转换的问题,而是思维模式交融的问题。

第四重是学院的话语体系与农民话语体系之间的博弈。话语权是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社会结构是由各种阶层组成的,各个社会阶层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因此“要用农民的话语方式”才被提出来成为一个研究命题和实践者的关注点。但是,什么是农民的话语方式本身也是一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比较流行的发展学研究,曾经将其种子弥散在各个学科中。发展概念源自于二战之后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经济代表团对于哥伦比亚的访问,其目的是为该国制定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个发展计划是以自身救赎(salvation)为导向的,其本质却是发展信念的最初表达,由此为建立以发展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做铺垫。“20世纪40年代英国发展法案首次将发展理念具体化,它就是对20世纪30年君权受到挑战的一种回应,因此必须被看作是一种重振帝国的举动。”<sup>②</sup>而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则以推行民主的形式实施干预计划,用医生的视角凝视世界政治格局。其中,“将第三世界幼儿化是发展作为一个救赎的世俗理论必不可缺的一部分。”<sup>③</sup>宗教视角转化为医学视角,医学视角的凝视转而成为一种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在这个程度上,平民阶级不再是种族意义上的概念,而被理解成多病的、没有被喂饱的、物质的且生理脆弱的集群,因此对着这一阶级需要空前的社会行动”<sup>④</sup>。发展话语的前提假设是“无论以怎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成本为代价,现代化是唯一能够摧毁陈旧的迷信与关系的力量,工业化和城市化被看作是通往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进步之路。”<sup>⑤</sup>这样下来,发展话语的构成因素包括“技术、人口与资源、货币与财政政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商业与贸易。”<sup>⑥</sup>以及一些与文化相关联的因素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系统,这种关系系统在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农业、公共卫生等领域被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知识系统改造之后,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术合法性。“发展史通过发现和制造‘异常’而得以不断进行的,随后它会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处理和改造。”<sup>⑦</sup>这种改造和处理的过程,不仅具体化在第三世界国家细致入微的档案资料中,也形成了所谓的发展方法体系,这样,不但在思维模式上,更是在行动力上,发展自上而下地扎根在观念、实践和学术理论中。

换言之,发展的概念本身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含了一种价值信念:农民身份是需要被从外部改造的,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是滞后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改造农民因此成为一个被公认的话语设定。那么,当学院派的话语体系与农民话语体系交锋的时候,农民会如何反应呢?

问“教材看了吗?”

答“没有,呵呵,没时间。”

问“教材中间有好多图片,挺好看的又很简单……”

答“不习惯看书了,字太小,看电视就挺好的。”

看到不少农民在做笔记,老师问道“讲得有意思吗?”

答“还行吧,呵呵,记笔记可以回去给村民说说,也可以给孩子讲讲。”

问“为什么不看教材呢?”

答“听着就行了,不一样吗?”

在这里,“教材”作为教师、政府官员反复讨论之后编写的物体,原本是信息监控的一个工具,是为了规训听课者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态度,却被当作是一个背景,安静地被陈列着。在这种被陈列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培训者的教师话语,还是培训者所“表述”出来的政府话语,都成为一种被农民试图消解的场景,信息传播过程本身成为传播的信息的解体过程,政府工作人员的信息监控、作为培训者的教师的信息监控以及乡镇以及村一级的礼堂和外围环境都成为一种监控体系,在这种监控中的农民,是信息传播关注的焦点。农民以各种散漫的姿态相互之间交流着,在新奇的词语和刻板的“会议”形式(自上而下)中,弥散着信息的抵达。

最终,信息传播被各种话语监控和场所监控方式所消解,最终变成了教师的话语体系、农民的话语体系与教材体系、政府信息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信息监控在各种力量角逐中成为另外一种信息传播的力量。

#### 四、媒介消费与生存伦理(media consumption and subsistence ethic)

作为授课者的教师,无论是学院派的教师,还是本土化的教师,在授课材料中的展示中,不仅选择了大量的图片、故事,还借用了许多电视节目、电影中的素材,试图根据农民的媒介消费习惯来提升培训效果。例如,在就业观念提升的培训中,授课者向农民推荐了教育电视台和天津电视台举办的职场类节目《职来职往》和《非你莫属》,并举例说明电视节目的运作原则是倾向于制造温馨而有影响力的效果,招聘的企业也

是以弱势导向的原则来在电视上选择员工的,农民或者农民工上台求职的话,成功率非常高。有农民问道:“上电视节目的话,是不是需要交钱啊?”授课者就借此机会讲述了电视节目生产和消费的一些原则和导向,鼓励农民可以摆脱自卑心理,提升自己的社会身份。有看过这些电视节目的农民,会兴致勃勃地和授课者互动,并说出自己印象深刻的求职节目,对主持人也会做相应的评价,“说话有点不尊重人,歧视人。”“说的话我们也不太明白。所以不敢上节目。”因为参加培训的农民对电视节目的消费更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其他的媒介,如报纸、杂志、书籍和互联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处于稀缺状态。手机是他们日常使用的工具。

授课者一开始还担心这些“主流化”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农民不喜欢看,也不愿意接受。授课之后发现,他们很希望听到这些信息,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除了电视剧之外,他们会选择新闻类、职场类、心理咨询类、教育类和谈话类的节目观看,“可以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啊。”很多农民在下课之后找授课者询问的都是子女教育问题,他们对教育问题的困惑很多。

“没有什么办法,自己也不懂,只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吧,起码比公立学校教的好。”

“孩子考不上大学,没办法,用拆迁款送他出国吧。”

“我没有念过多少书,小学就辍学了,所以孙子的教育现在要抓紧,多花点钱没关系的。”

“电视上常常说教育出了问题,我们也不懂,孩子咋办呀?”

当授课者告诉他们,对于教育而言,学前教育更为重要的时候,他们往往很受触动。尤其是对已经拆迁的农民来说,他们已经没有地可以种了。家里有几套房子,有一些存款,是用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农民身份换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但具体是什么生活,他们没有设想,只是根据电视中的一些描述进行想象。在这种情形下,媒介信息的诉求并没有呈现出授课者所预期的状态。一方面,农民对“陌生世界”的信息很渴求,另一方面农民对“熟人社会”的信息也很需要,他们需要“监测”周围的情况,以便让自己有安全的感觉。

等待拆迁的农民,尽管情况有点复杂,但是却有很大相似性:他们的家庭收入80%已经来自于非农收入了,打工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习惯化”的行为,土地在他们的眼里并非是维持生计的工具,而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理依靠。和已经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相比,他们的心理很安稳,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告诉授课者,他

们没事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得去原来的地里“溜达溜达”,有时候甚至只是为了“解个手”。

在媒介信息的选择上,完全拆迁的农民更关注职业类的信息,等待拆迁或者处于拆迁状态的农民在心理上更愿意关注与传统农业相关的信息。不少镇里的社保部门为了帮助农民更好地适应拆迁这一过程,根据拆迁状态办了一些小报,如《镇农民教育报》等,以案例的形式帮助农民实现拆迁前后的转变。授课者询问农民是否了解这些信息,他们的反应很茫然:

“不知道啊,报纸我们都不看的。”

“不管咋样,拆了还是好啊,要不几辈子也挣不到这些钱啊。”

“不舍得土地又咋样?现在也不依靠种地挣钱。”

拆迁这一社会行动,不仅改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他们的生存伦理。尤其是处于拆迁“路上”的农民。等待的时间越长,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消费习惯发生的改变越大。一位村干部告诉笔者,他们村从拆迁开始,到回迁户搬进楼房的三年时间内,去世的农民占全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拆和迁原本就是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需要等待,第二个过程也需要等待,等待的过程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常态的时候,生存的基本伦理便发生了变化。授课中,笔者发现,没有拆迁的农民,总会有人问道“说这么多没有用,我们想知道具体的拆迁时间。”拆迁作为一种集体规划,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演化为农民在媒体诉求上,他们在选择媒介信息的时候,也处于从对传统农业信息的需求到拆迁后身份转变之后的“新角色”的学习信息的需求。媒介消费习惯成为拆迁前后农民生存伦理转变的最为贴切的呈现工具。政府的培训信息一开始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继而转化为以“领报酬”的形式来被动获取信息,最终则将这种信息与日常生活、文化诉求、农民群体的自我成长结合起来。

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过培训的农民,自我学习的意识增加了,希望参加更多类似的培训班。一些镇根据培训农民的这些诉求,搞了就业明星表彰会。让在亦庄开发区工作有成就的农民来做报告,提供一些离开土地之后、成为“城市人”的一些体验和经验。

## 五、信息需求与反需求( information demands VS reversed-demands)

如前所述,授课的地点都在镇里或者村里的礼堂,村民们乘坐各种这样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三轮车、电动车、汽车等。他们大声招呼着,按照规定坐在村干部的后面,被分割为不同的区域,他们之间除了村里的人之外,与其他村里的人也大多不相识。50元钱这个

符号就像是一个魔咒,框定了他们参加培训的动机,对这种动机的清晰认知,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农民的边缘。政府工作人员也因此在一个不在场的场域中,根据关于农民的“乡土知识”构建了农民的需求,这种需求又被设定为是一种主动诉求。根据需求的政府话语模式,构建了农民的培训诉求体系。教师在这里扮演的是一种需求满足的角色。培训被分给为几个信息传播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培训前,第二个环节是培训中,第三个环节则是培训后。培训前的农民对自身的成长所需求的信息并无明显的主动诉求,他们甚至忘记了为什么要参加培训,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不发钱的话,他们才不来了!”笔者原本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授课的,与其他授课者交流的时候,尽管大家抱着作为老师尽责的态度,但是听众的反应对于作为授课者的老师而言,确实是一个严苛的标准。

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者Katz等人提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受众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是有目的的;受众是媒介的主动使用者;大众传播媒介能满足受众一定的需求,但必须是在与其他信息来源抗争中实现的;受众是理性的,理解和明白自己的基本诉求;受众以自己的视角来审视大众媒介的信息,并不会对大众媒介做任何价值判断。<sup>②</sup>这些假设笔者在这里将其转移到授课者与听课者的信息诉求与满足中进行分析。换言之,这些假设可以转换为:农民接受培训是有目的的;他们是培训项目的主动使用者;他们可以通过培训满足自己的一定需求,但必须与其他信息源相抗衡;他们以自己的视角看待培训信息,并不做出任何价值判断。按照这个思路分析农民在培训前、培训中和培训后的信息需求的变化与满足的改变。

首先,普通农民培训前有师资班和重点班,一个是培训给农民授课的老师,一个是培训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培训。也就是双重“动员”农民的工作。培训前的农民群体所选择的很单纯,与政府的设想一致,“如果不是为了误工补贴才不来呢!”这种表述在不同层次的话语叙事中都可以听到:政府工作人员、授课老师、村干部和本土化的师资以及农民自身。

笔者授课的时候曾经问过农民:“我知道大家来参加培训就是为了钱,但是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学习一点知识,坐在这里也是耽误时间啊。”这种表述在不同的农民培训班中说过很多次。培训之后,农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早知道是这种培训内容,我去年就来参加了!”一位30岁的青年男子说。

“老师,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我有很多问题希望以后请教你。”

“老师,你讲得真好!这么多年没人给我们上这种课了,不是技术培训就是学习政策……”

尽管农民在培训目的的选择上动机单一,培训项目的实施却改变了他们的信息诉求,随着农民信息需求的拓展,本土化的老师开始根据各镇的情况增加培训内容。政府部门也参与进来,将信息诉求转化为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合体形式,即用文艺表演、小品、原创话剧、演讲比赛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再培训。

换言之,政府、教师(培训者)所赋予的培训需求,在听课者(农民)和基层政府的组织过程中,以多种形式的文艺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内容,消解了“农民观念提升”这种叙述的含义。农民以这种看似规训<sup>③</sup>的形式进行着反规训的工作,尽管这种反规训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例如,规定九点钟上课,因为要签到,所以政府工作人员会通知农民八点半到,几百人陆续在礼堂门口按照要求,在自己村子所在的表格中,在自己的名字、性别、年龄和身份证后面签字,他们的行为被安排着,礼堂中位置也被设定了,第一排是各村的村干部,后面则是普通农民,但他们并非毫无声息地被规划着行为。<sup>④</sup>反规训的形式体现在随意交谈中,这种交谈一般发生在尚未拆迁的村子里,拆迁的村子的农民,等待回迁房子的,一般都自己租房子居住,很分散。而拆迁后搬进新居的农民,被社区也分割开来了,当这些农民被集中起来的时候,他们有一种难得相见的“熟悉感”,交谈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需求”被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唤起了,“反需求”便成为一种对政府培训项目“规训”行为的一种消解。

本土化策略不仅被运用在授课教师的内容中,例如当地的教师很多就是拆迁户,他们有的是当地的教师,有的是政府工作人员,但基本都是本地人,在培训中往往会与政府的培训话语体系发生更大的“疏离”现象(这是相对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培训者而言的)。授课之前,他们会在教室里(授课地点)播放一些生活常识的视屏、一些当地的戏曲片段,或者从网上下载一些幽默短剧、小品给农民观看,活跃气氛,然后结合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案例,进行授课,以这种形式所设定的授课内容,原来编写的教材之间有所偏离,但却更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信息需求和文化需求。

例如,某镇组织了农民观念提升的原创话剧比赛,参加过培训的农民都可以报名参加,比赛分为动员、初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决赛之后再由农民将入选的原创话剧进行排练,进行汇演。在汇演中,本土化的知识和信息和政府、教师的培训内容被柔和在一起,构成了对培训课程本身内容的一种反需求,这些原创的话剧,内容并不会框定在培训的范围之内,而是将日常生活中

的文化诉求演绎了出来。

笔者曾经遇到这样一个农民,她现在是区政府里的一名长期合同工。她的口才很好,口头禅是“我这种人,就像是一根细针,掉到人群里都找不到,被淹没了。”她原来就是农民,后来通过努力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她说“你以为村里的妇女主任那么好选上,我干掉了好几个人才当上的。”后来镇里举行演讲比赛,她报名参加了,提前准备了半个月,演讲稿都背下来了。表现出色到镇里工作,又依靠演讲能力到了区政府社保部门工作,培训的时候她常常作为就业典型去宣讲。即使聊天的时候,她讲话也很像是在演讲,有一种“暗暗”的力量在里面,这种力量在培训后农民的自我成长中体现出来了。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小品表演和话剧演出一样,如果将农民观念提升字样去掉的话,农民自身演绎自身的能力却能更为妥当地呈现出来。

在这里,需求话语被转化为反需求,也即主动诉求。城市化的话语和拆迁的背景隐退为一种布景,布景中走出来的主角不再是政府、培训者,而是农民群体自身。他们塑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和集体记忆,并将这种属于自己的历史和集体记忆与“过去”关联起来,构建了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和行为模式。

## 六、结论与思考

农民观念提升工程是由政府组织、与高校以及当地的师资相结合,共同完成的对于农民进行有层次的培训行为。这种培训行为是一个多方参与的社会行动过程。签名本、演出的图像、演讲比赛的现场、培训动员的场景、授课的光盘以及其他辅助材料,在年终总结的时候都被很好得尘封起来,作为现场和历史的一种档案,这种档案在新的媒介技术的覆盖下,呈现出鲜活的历史色彩与社会现场感。

首先,农村拆迁是一个涉及到农民生存方式转变为核心的一个行动过程,在这个行动过程中,农民的利益诉求、政府的利益诉求和企业的利益诉求被隐退为一个大的社会场域,这个社会场域中的种种冲突,在政府所设立的培训项目被转化为“人自身”的问题,农民作为“群体”的问题,农民作为“个体”的问题。在这种转换中,培训者的意图与被培训者的反应之间构成了传统到现代过渡的一个联系地带。时间和空间不再凝固的,而是流动的,因为“凝固着”的农民被“迁徙”了,培训是对这种“迁徙”过程的一种“注释”。

其次,“注释”是外来者(政府角色、培训者群体)对本土者(农民)的一种响应。“注释者”的身份在信息的“编织”中被分割为各种内在冲突的群体,信息从而转换为传播与监控的问题。传播成为一个依靠信息

而共同生产和消费信息的过程,培训者和被培训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与授的关系,而更多呈现出写作者的特征来。对这种传播过程的监控则超出了政府、培训者、基层管理者的想象之外。

第三,想象共同体在培训实践中被糅合在一起了。通过场所的延伸、空间的绵延和工业时间的设定,政府、农民和培训者共同设想了一个想象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种意识在培训过程中被规训着,信息的监控与反监控、传播者自身的监控与反监控、接受者自身的监控与反监控,在这多样化的监控中,场所中充斥着各种信息的编码、解码和释码过程,政府对农民的形象、培训者对农民的形象、农民对政府的形象、农民对培训者的形象、政府、农民和培训者对于场所的共同想象,构成他们对民族国家的一个共同想象,在这个想象的背景中,作为渗透力量的则是媒介信息传播系统。

第四,在培训设置的场域中,作为人的生存伦理被“漂移了”,“漂移”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目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漂移”的不仅仅是拆迁的农民,还有被从“熟人社会”被“抽离”出来的个体。个体被抛弃在没有一个附着物的空间中,无论是主动的个体化还是被动的个体化,都被渲染了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消费主义散播着这种生存状态,孤零零的个体被原有的社区所抛弃成为“都市里的陌生人”,生存伦理也因为演化为了消费伦理,生产偶像因而也变成了消费偶像。

第五,当新的媒介技术开始以全球化的形式侵入大众生活的时候,媒介的平民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生产、消费成为一个关联的平台,原有的培训模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勒纳所说的读写能力也遭到技术的质疑,新的读写理论(New Literacy Theory)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人们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技能才算拥有读写能力:一是互联网及其新信息传播技术所需要的技能、策略、配置和社会实践能力;二是在世界社区(a world community)中拥有完全民主的、经济的和个人化的参与;三是新的读写能力具有动态(dynamic)和同步特征;四是新读写能力是多重的和多模式的,在多元化和跨学科的视野中加以认知。<sup>⑤</sup>互联网中的社会化媒体无疑为这种新的读写理论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被培训的农民,随着培训的展开,除了手机之外,不少人开始使用互联网,并开始在网上自娱自乐。当地的培训者也使用一些网络素材来传输信息,在多年前脱离了原有的学校教育之后,新技术给了农民获得知识的新途径。逐渐具有独立意识的农民,在市场信息、政府信息、专业信息等交汇中,也开始脱离本土化,以技术参与和信息参与、从信息参与到个体参与,培训赋予他们

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参与中国社会变迁、全球化发展的懵懂意识。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农民观念的提升是一个农民主动参与和反被动参与的过程,他们以行为“对抗”社会各个阶层和媒介对他们的想象,同时又依靠他们作为传统价值观念携带者的“优势”,对政府、培训者、基层管理者进行“反想象”,这种“反想象”带有一种失去土地之后的灵魂漂移的意识,也带有一种“被动个体化”之后的无奈心理。涂尔干(Durkheim)的提出

的个体化和社会凝聚力的命题在这里再次被提出来了:获得财富、失去土地;获得新身份、失去老社区。在混杂的想象共同体的制造中,农民迷失在现代性的叙事体系中了,也同时反思着这种叙事本身。

(本文系2011-2017年农民观念提升工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项目(项目编号:1121-21057022)的研究成果。感谢北京大兴区农委的工作人员、农机学校的老师们,中国农业大学的左停、蒋爱群、王智杰、何美丽等老师,以及每年参加调研培训的学生。)

#### 注释:

- ① Daniel Lerner(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②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③ 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2003年第3期;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5年版;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边缘的游戏: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李红艳《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谭英《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
- ④ Carolyn Cartier, Manuel Castells and Jack Linchuan Qiu (2005). *The Information Have - 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0, No. 2, pp. 9 - 34.
- ⑤ De Andrea D. C. & Walther J. B. (2011). *Attributions for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Self-present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 pp. 805 - 825; Westerman D., Van Der Heide B., Klein K. A. & Walther J. B. (2008). *How Do People Really Seek Information about Others? Information Seeking across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pp. 751 - 767.
- ⑥ 王锋、赵凌云《我国被征地拆迁居民满意度调查: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2期(总第38期);孙静宜《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关系问题研究:以房屋拆迁为例》,苏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骆芸芸《征地拆迁中的政府行为失范行为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朱冬梅、高敏《城乡一体化拆迁中不同利益主体行为的经济分析》,《经济问题》2009年第2期;吕凯《旧村改造中农民拆迁安置的现实困境与长效保障——以奉化市梁家墩王叶旧村改造为例》,《三江论坛》2010年第10期等。
- ⑦ W. I. 托马斯、F. 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Heather A. Horst (2006). *The Blessings and Burdens of Communication: Cell phones in Jamaican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s*, Global Networks 6 (2), pp. 143 - 159. Anastasia N. Panagakos and Heather A. Horst (2006). *Return to Cyberia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 world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s*, Global Networks 6 (2), pp. 109 - 124. Natalia Khvorostianov, Nelly Elias and Galit Nimrod (2012). *Without it I am Nothing: the Internet in the Lives of Older Immigrants*, New Media & Society 14 (4), pp. 583 - 599. Eric C. Thompson (2009). *Mobile Phones, Communities 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Foreign Workers in Singapore*. Global Networks 9 (3), pp. 359 - 380.
- ⑧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and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⑨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 ⑩ 大兴区位于北京市南部,全区总面积103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3.3万亩,14个镇和5个街道办事处,527个行政村。
- ⑪ 为了全面了解村民的培训需求,选择村庄的标准是根据村庄受拆迁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定,其中,每个村庄计划调查村干部和典型农户5户、普通农户10户左右。在所选择的10个村庄中,有8个已拆迁村庄和2个即将拆迁村庄,砖楼村的村民已经住进拆迁小区——罗奇营小区,其他村庄村民均处于租房居住状态。
- ⑫ 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左停老师和蒋爱群老师的慷慨支持,部分数据来自课题组的前期调研。
- ⑬ 2012年培训内容上增加了北京精神和阳光心态方面的内容。
- ⑭ 2013~2014年培训内容则增加了中国梦和美丽大兴、幸福生活方面的内容。
- ⑮ 笔者在大兴区培训的14个镇中,每个镇的培训都以授课老师的身份参加了,包括师资班、示范班和普通班的培训。
- ⑯ 在镇里组织的培训中,有的镇增加了法律意识的培训。
- ⑰ Benedict Anderson (1991 revised editi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USA: Courier Companies Inc.
- ⑱ 统计数字来自于2011年终的项目评估报告(内部资料),感谢大兴区农委的大力支持。
- ⑲ 统计数字来自于2012年终、2013年、2016年的项目评估报告(内部资料),感谢大兴区农委、农机学校的大力支持。
- ⑳ [英]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 ㉑ 参见[英]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厄里《符号和空间经济》,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 ㉒ 参见[美]利奥·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甘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 ㉓㉔㉕㉖㉗ [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吴慧芳、潘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9、32、33、43、45、46页。
- ㉘ Katz E., Blumler J. G. & Gurevitch M. (1974). *Uti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by the Individual*. In J. G. Blumler & E. Katz (Eds.).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19 - 32.
- ㉙ 参见[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 ㉚ 有时候,礼堂中会发现农民带着孩子来听课,“放在家里也没人看着,听课又不影响”,有时候则会看到他们带着家里的狗在礼堂里,但这种情况很罕见。政府组织的活动对农民有一种震慑力。
- ㉛ Christine Greenhow, Beth Robelia (2009). *Old Communication, New Literacies: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Social Learning Resourc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 pp. 1130 - 1161.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毓强】